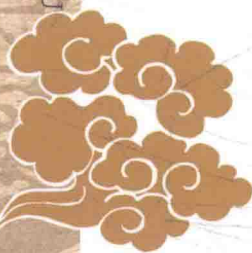


主编 姜冷

编辑视域中的 辽金元文化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BIANJI SHIYUZHONG DE LIAOJINYUAN WENHUA YANJIU



主编 姜冷

编辑视域中的 辽金元文化研究

BIANJI SHIYUZHONG DE LIAOJINYUAN WENHUA YANJI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视域中的辽金元文化研究 / 姜 冷 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207 - 10895 - 1

I. ①编… II. ①姜…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K2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7709 号

责任编辑: 姚虹云

封面设计: 张 慰

编辑视域中的辽金元文化研究

姜 冷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电子邮箱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5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895 - 1

定 价 57.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言

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多数学者大都集中在以“正史”为中心的某个断代研究上,而对于那些地方性的或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则关注不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也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中华文化是各具个性的多元文化统一体。漫长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多元的统一更具丰富的内涵,统一中的多元更显得斑驳陆离。以“统一”的视野去审视其中的“多元”,以充分认识“多元”为基础去完善“统一”,是进行历史文化研究应当遵循的辩证法思想。辽金元三朝分别是由契丹、女真、蒙古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中契丹、女真两个种族随着其朝代的灭亡早已湮没无闻;今天的蒙古与13、14世纪的蒙古族也已有了很大的距离。结合10至14世纪中国南北各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背景,把10至14世纪的辽金元作为一个时段进行整体研究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阜新,历史上属边塞地区,除汉族外先后有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迭起兴衰在此,使这里成为各民族相互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阜新曾是契丹族重要的活动地区之一,也是辽朝统治中心之一。契丹文化、辽代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挥高校学术优势,为北方民族史研究、为阜新地方历史与文化研究搭建坚实的平台,于2002年开辟了《辽金元文化研究》专栏。2014年,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辽金元文化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

《辽金元文化研究》栏目的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全文转载,30多篇论文在专家学者年度研究综述中被摘引与评述,这些综述性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又有近50篇论文



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法理学·法史学》、《经济史》、中国辽金史学会、中国法制史学会、唐史学会、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会等检索。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优选2015-2016年刊发的部分文章汇编出版,以编辑视域从考古、人物、经济、历史、文化五方面记录辽金元文化发展概况,希望为辽金元文化研究者提供借鉴,同时对地方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区域文化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邢宝君

2016年10月



目 录

· 考 古 ·

石刻文字所见辽朝战事考补	(2)
《东相王村董家庄双墩碑》考释	(13)
辽代兴中府的世家大族	
——以朝阳地区纪年墓葬为中心	(17)
辽河东部地区金代遗址探析	(25)
辽代城市的类型、特征与变迁	(38)
从现存辽代佛教古迹看辽代佛教信仰	(44)

· 人 物 ·

宋朝秦桧是否为金朝“奸细”考辨	(54)
辽穆宗历史地位再评价	(64)
大辽皇后萧观音冤狱的多维视角研究	(70)
刘整若干史实探讨	
——宋元之际降将研究之二	(83)



· 经 济 ·

辽代商业研究综述	(92)
辽朝手工业门类与生产场所考述	
——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100)
辽朝中晚期的部落赈济探析	(109)
金代兴中府及其毗邻州县经济发展的原因	(115)
金朝货币交钞管理措施与成效	(122)
元代朝阳地区经济发展述略	(129)

· 历 史 ·

辽朝紫金鱼袋考论	(136)
辽代的驸马都尉	(145)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153)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159)
辽代西京地区民族分布与民族交流	(164)
辽代川州长宁军节度使探究	(173)
《辽史》所记贪官及其社会危害	(181)
辽金之际医巫闾地区争夺战及其原因	(186)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193)
宋辽刺事人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202)
契丹皮室军职能转变原因探析	(211)
金代汉制封爵研究综述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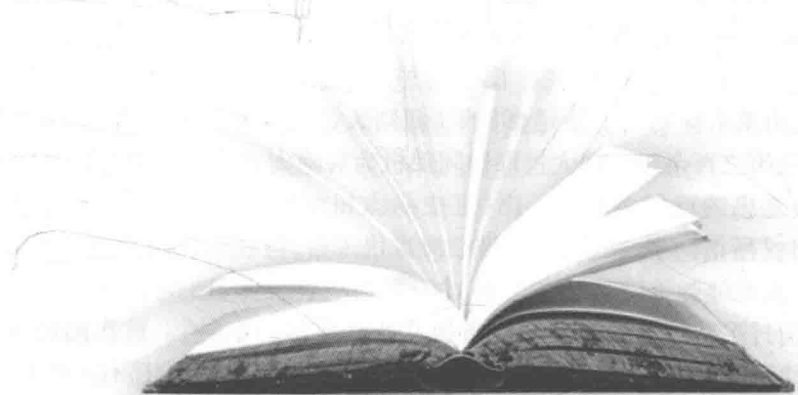


金代司法官员选任制度探究	(226)
金朝后妃封号与选纳制度探析	(237)

· 文 化 ·

辽朝科举考试内容考论	(246)
略论辽代各族女性的文化贡献	(251)
辽金政权下的杂剧演出和从业伶人	(256)
契丹人的自然神崇拜及“东向”习俗	(263)
金代医者及其类型	(269)
“术”与“道”:金代儒学接受的变容 ——以孔庙的修建为主线	(278)
元代漠南地区儒学教育情况探析	(286)
元代上都赋体文学创作述略	(291)

— 考 古 —





石刻文字所见辽朝战事考补

张国庆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引言

契丹辽朝“以武立国”,200余年间无论是域外征掠还是境内平叛,契丹军队参与的大小战事已难以计数。辽朝战事大都见载于《辽史》“纪”“传”及相关传世历史文献中。但文献记载的辽朝战事仍有遗漏或语焉不详处,难以全面展现所有战争之全景,对辽朝战争史事研究,必定产生不利之影响。钩沉出土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发现在辽人墓志铭特别是辽朝武职官员的墓志铭中,大都有墓主生前参与某次战事不同程度之记载。石刻文字中有某些战事细节之描述,对补充《辽史》等文献记载之缺漏,尽力复原当年战事之原貌,非常有益。

一 辽灭渤海国之战

渤海国是唐代由粟末靺鞨人于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在东北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至契丹辽建国已历二百余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解除南进攻掠中原的后顾之忧,决定先平灭被视之为肘腋之患的近邻渤海国。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辽太祖天赞四年(925年)“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1]21}。经过一系列战役,至天显元年(926年)三月,渤海国王大諲譔投降,契丹军队攻下渤海国所有州县,“改渤海国为东丹”。此次随阿保机平灭渤海国的,除皇后述律平、皇太子耶律倍及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之外,还有一些契丹族官员,如惕隐安端,北府宰相萧阿古只,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等。^{[1]22}另据《辽史》“列传”记载,汉族官员韩知古、康默记、韩延徽等亦随军参战。

实际上,契丹军队早在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即已有过东征渤海国的军事行动。《辽史·太祖纪》载:天赞三年(924年)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锈实而掠其民”^{[1]19}。概因渤海人的挑衅,两个月后,阿保机即率军攻打渤海国,但此事《辽史》未见记载,仅见诸《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如《旧五代史》卷32《唐书八·庄宗纪六》即云:同光二年(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七月壬戌,幽州奏契丹案巴坚(阿保机)东攻渤海”。

契丹辽朝灭渤海国之战事亦见载于辽穆宗应历五年(955年)的《陈万墓志》(刻石时间为



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陈志”记载“豪刺军使”陈万,“年卅五,从皇帝东口渤海国,当年收下;年卅七,又从嗣圣皇帝伐神欢二州,当年又下”^{[2]16}。“豪”即“豪州”。《辽史·地理志》“头下军州”条即云:“壕州,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3]据向南先生考证,此“国舅宰相”应是萧阿古只。也就是说,作为萧阿古只私城头下军州——豪州军官的陈万是跟随主人一起东征渤海国的,隶属于天下兵马大元帅(嗣圣皇帝)耶律德光麾下。“陈志”记载陈万曾两次随军东征渤海国,第一次是在他45岁那年,跟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东征;第二次是在他47岁那年,随萧阿古只在耶律德光军中东征。契丹灭渤海国之战,主要发生在天显元年(926年)正月至三月间。“陈志”中的“神欢二州”指原渤海国的神州与桓(欢)州。如果47岁的陈万随耶律德光伐渤海“神欢二州”是在天显元年(926年),那么,45岁时的陈万随耶律阿保机东征渤海国,即应在天赞三年(924年),此即恰好佐证了《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也补充了《辽史》“本纪”记事之缺漏。

二 辽宋之战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辽宋北南对峙开始。北宋建国之初,执行的是先南后北方针,因而,在公元979年之前的近20年间,辽宋双方关系处于暂时的平和状态。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宋灭北汉后,决定接续北伐,收复石晋割辽的燕云失地,辽宋之战,由此拉开序幕。从公元979年开始,直至公元1004年辽宋签署澶渊停战协议,20余年间,辽宋之间大小战事难以计数,仅阶段性的大战就有三次:

前两次均是北宋主动出兵北伐。第一次即“高粱河之战”。公元979年七月,宋太宗赵匡义欲借灭北汉之余威,乘胜攻辽,夺回燕云十六州失地。宋军一路东进,辽易州、涿州守将相继献城投降,宋军直抵燕京(辽南京)城下。沙河之战,辽军失利。接着,辽蓟州、顺州守军亦纷纷降宋。但辽军主力在韩德让、耶律休哥及耶律斜轸等人统率下,拼死抵抗,奋起反击,终于在燕京高粱河大败宋军。宋太宗赵匡义险些被活捉,乘驴车狼狈逃归。

第二次即“燕云之战”。辽景宗死后,年幼的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宋太宗赵匡义认为伐辽的机会终于到来,便于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三月,大举兴兵,三路北伐。开始,宋军攻势迅猛,连连取胜。东路曹彬连下歧沟、涿州、固安、新城等地,军威大震;西路潘美则进击寰、朔、云、应等州;中路田重进出飞狐北,辽西南面招讨使战败被俘。面对汹汹而至的宋军,承天太后与圣宗皇帝下诏亲征。在著名契丹族将领耶律休哥的调度与指挥下,辽军开始反击。是年五月,辽宋军队在歧沟关展开决战,结果是宋军大败。

宋军两次主动北伐均以失败而告终,士气被挫,元气大伤。从此,辽宋战局发生逆转,辽军由被动抵抗转为主动出击。从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年)到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多次主动出兵南下进攻北宋,开始了辽宋之战的第三阶段。比如统和十七年(999年)俘宋将康保裔的瀛洲之战,统和十九年(1001年)大败宋军的淤口、益津之战,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俘宋将王继忠的望都之战,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的澶州外围之战,等等。

出土辽代石刻文字对《辽史》疏漏未记的辽宋之战某些细节,比如对某一阶段大战中的某次战役、某位辽军将领的战场表现,比如对某些战事要素出现的时间、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俘虏敌军将领情况,等等,均有所补述。如辽圣宗统和九年(991年)的《韩瑜墓志》即记载了统



和四年(986年)辽军收复涿州后的辽宋长城口之战,以及辽军著名将领韩瑜受重创而殉国之事。“韩志”云:“昭圣皇帝(辽圣宗)哀燕民之若子,忿赵氏以如仇。北率天兵,南行国讨。仍观敌寇,据彼长城。筑垒犹坚,横戈甚众。公(韩瑜)方当扈从,切在剪除。以夺人为先谋,以亡躯为尽瘁。因俯营擒狡,释铠传宣。攻长城口,俄为流矢中首。然虽抱楚,尚更摧锋。金疮寻发于朝昏,委命几临于泉壤。”^{[2]94}韩瑜为辽代著名悍将,出身于韩氏世家大族,为韩知古之孙,韩匡美之子,韩德让之叔弟。“韩志”也佐证了宋人路振《乘轺录》的记载,只不过韩瑜中箭的地点两者有所不同,一为“长城口”,一为“澶渊”。《乘轺录》云:“虏旧有韩统军者,德让从弟也,娶萧后姊,封齐妃。韩勇悍,多变诈,虏之寇我澶渊也,韩为先锋,指麾于城外,我师以巨弩射之,中脑而毙,虏丧之如失手足。”^[4]

辽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辽军大败宋军的淤口、益津之战,元修《辽史》及南宋人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均记载辽军在是年十月遭遇罕见冬雨天气而受挫班师。如《辽史·圣宗纪》即云:统和十九年(1001年)“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盐沟。……甲寅,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丙寅,次满城,以泥淖班师”^{[5]156-157}。《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宋真宗咸平四年(辽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十月甲寅,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契丹遇于长城口。时积雨,敌弓用皮弦,皆缓溼。斌击败之,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6]。而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的《耿延毅墓志》却记载辽军此次南伐因遇雨而班师是在十一月。“(统和)十九年,今上(辽圣宗)奉我承天皇太后再伐赵宋氏。冬十一月,军次冀北,方大雨,乃班师。并代中山戍卒乘其乏,盗我边民。公率麾下,伏草依岩,卷旗卧鼓,身先勇士,衔枚进击,斩贼首千余级,清境以闻。”^{[2]160}二者孰是,待考。

辽宋交战,多以辽军取胜而结局,故而,文献史料中常见宋军将领战败被俘的记载。但传世文献对北宋中下级军官及其他人员被俘则记载不全或有遗漏,石刻文字可以补正之。如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的《冯从顺墓志》即记载了冯从顺与原宋瀛洲兵马都统、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战败被俘的经过:“统和十七年九月,承天太后金坛拜将,玉帟运筹,因兴丹浦之师,直指黄河之渡。宋主(宋真宗)以公(冯从顺)素负令器,□□宸聪,爰委重权,可属大事,遂与瀛洲兵马都统康保裔同驱军旅,来御王师。十万兵溃而见擒,一千载圣而合契。”^{[2]169-170}宋将康保裔等人战败被俘,《辽史·圣宗纪》亦有记载:统和十七年“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石砦,破之。次瀛洲,与宋军战,擒其将康保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5]154-155}“冯志”佐证了《辽史》的记载。但《辽史》记载与康保裔一同被俘的宋将名为“宋顺”,而非“冯从顺”。个中原因,或是《辽史》漏记被俘的“冯从顺”,或是误将“冯从顺”写成了“宋顺”。康保裔入《宋史》“忠义传”,言其与辽军作战殉国,显然与史实不符,应以“冯志”及《辽史》记载为准。辽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的《李知顺墓志》记载了原宋廷宦官李知顺被俘入辽之经过,《辽史》未见记载。“公(李知顺)生在并汾,长于汴洛。幼在内庭,出宣帝命。时属我朝方兴甲马,……遇崆峒大举之秋,是寰海横行之日。未逢大阵,俄捷偏师,俘公而来,远诣行阙之下。……统和二十四年,擢为西头供奉官。”^{[2]187}

辽宋交战,双方于战前均有各自战术之谋划。石刻文字对某次战役辽军之战术亦有一定反映。如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的《耶律元宁墓志》即记载了景宗时期辽宋燕京高粱河之战,耶律元宁统兵参战过程中,辽军部署的两翼夹击之战术,并因此而取得胜利之史实。“后以伪宋糜料不敌之势,载举无名之师,扰掠我边疆,凌犯我郡邑。景宗皇帝遂命诸将分御



彼徒。北大王、惕隐备西轶之虞,以公(耶律元宁)扼东人之患,两道齐进,一时夹攻。成败宋之雄名,立全燕之显效。”^{[7]43}

三 辽丽之战

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发动武装政变,在半岛建立高丽政权,史称王氏高丽。王氏高丽与契丹辽国东西为邻,二百余年,或战或和,关系比较复杂。至辽圣宗统治的辽代中期,高丽与“宗主国”辽朝的关系恶化,于是,辽圣宗诏令辽朝军队对王氏高丽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征讨。第一次武力征讨是在辽圣宗统和十年(992年)。圣宗令东京留守萧恒德率辽朝大军讨伐王氏高丽。由于王氏高丽与辽朝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对辽的攻讨未做准备,所以,面对突然逼近的辽朝大军,高丽军队只能仓促应战,结果可想而知。高丽国王便紧急遣使至辽,乞求罢兵停战。

辽军第二次征讨高丽是在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据《辽史》记载:是年“五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洵”^{[8]1520}。圣宗皇帝以“高丽康肇弑君,大逆也,宜发兵问罪”^[16]为借口,再次出兵东征。

契丹辽国第二次征讨王氏高丽,双方互有胜负。好在时间不长,辽朝军队便很快西撤回国。对辽来说,虽然除掉了高丽弑君元凶康肇,但似乎真正的目的并未达到。圣宗皇帝的“目的”是使王氏高丽彻底臣服于辽。圣宗皇帝诏令高丽国王王诵按时至辽朝贡,王洵却一再借故推托,为此,圣宗十分不满。加之辽朝向王氏高丽索回“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六城未果,于是,辽圣宗便于开泰三年(1013年)至开泰八年(1019年),诏令辽朝军队对王氏高丽实施了第三次大规模武力讨伐。辽第三次征讨高丽历经六年,尽管数易军帅(先后有国舅详稳萧敌烈、北府宰相刘慎行、枢密使萧合卓、东平郡王萧排押等),劳师动众,最终在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之下,仍未达到预期目的。

圣宗年间辽朝三次出兵征讨王氏高丽,辽丽之战事除见载于《辽史》、《高丽史》等传世历史文献外,出土石刻文字亦有一定反映,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漏。如辽圣宗统和十年(992年)的辽军第一次征讨高丽,文献记载辽军的统兵将领是驸马、兰陵郡王、东京留守萧恒德。如《辽史·萧恒德传》即云:“时高丽未附,恒德受诏,率兵拔其边城。王治惧,上表请降。”^[10]“王治”即高丽国王。同书《二国外记·高丽》亦云:统和“十年,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8]1519}《高丽史》记载辽朝第一次征讨高丽的将领名萧逊宁。萧逊宁即萧恒德,逊宁是萧恒德的字。至于随萧恒德一起参战的其他将官,诸文献并没有记载,而石刻文字却有反映。据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的《耶律元宁墓志》记载,时为东京统军兵马都监的耶律元宁作为先锋官,参与了此次辽军对高丽的征讨,战功卓著。“会高丽将阻河海,绝贡苞茅。(耶律元宁)时与驸马兰陵王(萧恒德)奉顺天之词,问不庭之罪。公躬率锐旅,首为前鋒,始遇敌于建安之南。贼卒向三千余众,犄角才旅,剪戮殆尽。我一贾于余勇,口累公于降书。口为藩臣,永事天阙。故高丽岁时之贡,不绝于此,由公之力也。”^{[7]43-44}

辽朝第二次征讨高丽规模较大,不仅圣宗皇帝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还有不少著名契丹族将领随驾参战,如北宰相、驸马都尉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都监,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马群太保耶律盆奴、东京留守耶律弘古,或为先锋官,或领方面军。但随



驾参战的辽军将领还远不止文献记载的这几位,如萧仅。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年)的《萧仅墓志》即云:“今上(辽圣宗)亲御六龙之驾,专征三韩之邦。公(萧仅)横驱虎旅之师,怒罚鸡林之域。”^{[2]191}如韩椅。辽兴宗重熙六年(1037年)的《韩椅墓志》即载:“旋以辰卜弑君,口驹作梗。万乘恭行于讨击,六师毕集于征伐。……即授公(韩椅)左第一骁骑部署。军还,加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归化州军州事。”^{[2]205}如赵匡禹。辽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的《赵匡禹墓志》记载:“是时东韩作梗,不遵王命。公(赵匡禹)乃荐膺明诏,俾遂狙征。鞠旅陈师,始严于开托;解纷排难,终致于清平。”^{[2]300}如萧恭(约直)。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年)的《萧义墓志》记载:“曾王父恭,在圣宗朝高尚自晦,丞相韩德让因事奇而举之。起家授南面承旨。历林牙、夷离毕等官,拜平章事。时东韩夷弗逊,公讨有功。”^{[2]623}等等,均可补《辽史》记载之缺漏。

四 辽夏之战

西夏是公元1038年由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政权。西夏王朝以及此前的党项夏州政权与契丹辽朝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或附或叛,或和或战。但学界所谓“辽夏之战”一般是指重熙十三年(1044年)的辽夏“河曲之战”,以及重熙十八年(1049年)至二十二年(1053年)的辽夏“贺兰山之战”。

“河曲之战”。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以境内夹山党项岱儿族(又名呆儿族)人叛辽附夏,被李元昊收容,以及山西部族节度使、党项人屈烈带五部人叛入夏境为由,诏令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发兵征讨西夏。初战辽军即失利。十月,辽兴宗耶律宗真率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率骑兵七千出南路,以北院枢密使萧惠领骑兵六万出北路,以东京留守萧孝友率军为后应。辽朝三路大军渡过黄河,直入西夏境内四百余里。李元昊率军迎战,被辽军击败。李元昊退守贺兰山,采用焦土战术,耗费辽军生力。两军决战之日,突然狂风大作,飞尘蔽日,天助夏军最终取胜,兴宗皇帝险些被俘,侥幸逃脱。李元昊在反败为胜情势下,遣使与辽讲和,并放回了被俘的辽朝驸马都尉萧胡睹等。因最后辽夏两军交战地点是在河曲,故史称“河曲之战”。

“贺兰山之战”。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年)正月,辽为雪河曲战败之耻,乘李元昊刚刚去世、即位的李谅祚年幼之机,拘留西夏贺正使,停止对李谅祚的册封,并遣使北宋,以伐夏相告。七月,辽兴宗诏令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为河北道行军都统,兴宗皇帝自统中路大军,再次出兵征讨西夏。乘舰船而进的萧惠部南路军突遭西夏军队伏击,猝不及防,死伤惨重。北路耶律敌鲁古部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殄之。”^[11]小胜夏军。至次年二月、三月、五月及六月,在西夏境内及双方边境地区,辽夏之间仍有多次规模不等、互有胜负的战事发生。

实际上,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因辽、夏(指党项夏州政权)、宋之间特殊三角关系,辽与党项夏州政权之间即已有过战事发生。《辽史·景宗纪》即云: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年)“三月壬午,耶律速撒等献党项俘,分赐群臣。”^[12]《辽史·耶律速撒传》亦云:保宁“四年,伐党项,屡立战功,手诏劳之。”^[13]但《辽史》所记均较疏简。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的《耶律元宁墓志》对党项保宁年间耶律元宁参与辽军征讨党项夏州政权的战事有相对具体之记载,可补史缺。“南夏作梗,皇朝出师,本府王以从。祖弟故于战阵山列之处,矢石星敷之际,告失旗鼓



之利,求解兄弟之难。公(耶律元宁)奋雄勇之志,率骁果之骑,数不满百,威可当千,掠蛇豕以孤飞,突鹤鹅而深入,俄而俱得所遗兵器而还。因是军功达于睿听,宣署北大王府管军司徒。”^{[7]43}

至圣宗统和初年,辽朝仍有出兵征讨党项夏州政权之举。如《辽史·圣宗纪》即云:统和二年(984年)二月“丁未,韩德威以征党项回,遂袭河东,献所俘,赐诏褒美。”^{[14]113}《辽史·韩德威传》亦载:“统和初,党项寇边,一战却之。”^[15]所记均较简陋。而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的《韩德威墓志》可对《辽史》之记载有所佐证和补充。“韩志”云:“圣上谓其烟尘未殄,宵旰兴忧,举一戎大定之师,恭严讨伐;总十乘启行之律,必求师臣,以公(韩德威)为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公则陈借筭之谋,膺推毂之拜。员半千三阵,孰测深机;诸葛亮七擒,咸钦秘略。戢兵禁暴,拓土开疆。”^{[7]35}

当然,石刻文字对辽与此后西夏政权的战事也有一定记载。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的《耶律仁先墓志》即云:辽兴宗重熙“十八年,大兵西举讨夏国,命王为都统军。”^{[2]353}《辽史·耶律仁先传》记载仁先此次伐夏为先锋官。又,辽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的《萧袍鲁墓志》记载了萧袍鲁参与伐夏之事:“重熙中,银夏不恭,灵旗指伐,白旄黄钺,方亲御于六军;尺籍五符,委分提于七校。以公(萧袍鲁)押领殿中司一行兵马。公奋其余勇,务在先登。提鼓建旗,连挫敌人之锐;献俘授馘,常居诸师之先。”^{[2]424}下级军官萧袍鲁随军伐夏,《辽史》等文献不载,此亦可补史缺。

五 北疆御敌之战

辽朝的北部(包括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分布着许多属国与属部,比如西北和正北的乌古、敌烈、阻卜,东北的室韦、女真,等等。对于契丹辽国来说,这些北疆部族时叛时附,飘忽不定。叛时则犯边内扰,辽朝政府便出兵御敌平乱,因此,辽朝政府与北疆诸属国、属部的战事时常发生,终辽之世从未间断。

比如同乌古部的战事。乌古又称乌古里、羽厥、于厥等,分布于辽朝上京道北部,约今额尔古纳河流域及呼伦贝尔以东一带。辽朝政府在乌古人活动地区先后设有三河乌古部详稳司、乌古部节度使、乌隗于厥部大王府、于厥里部族大王府、于厥国王府等属国或属部机构。据《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等记载,契丹辽从公元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乌古人进行征服,并在该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严密控制乌古人,还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向该地区进行移民屯田等。但乌古人仍是叛附不定,《辽史·营卫志》即云:“乌古部。……右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16]所以,辽与乌古人的战争在所难免。

辽朝军队与乌古人的战事除见载于《辽史》等传世文献外,出土石刻文字亦有反映。如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的《耶律延宁墓志》即记载了身为“羽厥里节度使”的耶律延宁在一次与羽厥里人的战斗中负伤殉国之经过。“公(耶律延宁)尽忠尽节,竭力竭身。景宗皇帝卧朝之日,愿随从死。今皇帝(辽圣宗)念此忠赤,特宠章临,超授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漆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公威极北之疆境,押沮揆之失围。闻见归降,例皆森耸;妖讹扫尽,荡灭凶顽;路不拾遗,安人得众;天人道满,寿尽者



然。以统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于羽厥里疮疾而薨,年三十九。”^{[2]85-86}耶律延宁与羽厥里人作战负伤而卒,《辽史》未载。墓志文字中的“失围”即室韦;“沮掇”意不明,有言“鞑靼”者,向南先生认为不可取。^{[2]87}此外,身为羽厥里部节度使的耶律延宁所统辖的已不仅仅是羽厥里(乌古)一部,附近的室韦部似乎也在他的辖制范围之内。

同敌烈部的战事。敌烈,又称迪烈、迪烈得、迭烈德、达里底等。因其有八部,故而又“八部敌烈”或“八石烈敌烈”之名。敌烈人居乌古西部,即今克鲁伦河流域。辽朝政府在敌烈地区亦设有管理机构,如迪烈得国王府、敌烈八部详稳司、敌烈节度使司等。但辽与敌烈的关系并不稳定,敌烈人经常反叛内扰,因而,辽朝政府亦经常派军队进行围剿平叛。如《辽史·圣宗纪》即云:统和十五年(997年)五月,“敌烈八部杀详稳以叛,萧挾凛追击,获部族之半”^[17]。又,《辽史·耶律世良传》亦载:辽圣宗开泰三年(1014年),“敌烈部人夷刺杀其酋长稍瓦而叛,邻部皆应,攻陷巨母古城。世良率兵压境,遣人招之,降数部,各复故地”^[18]。稍瓦是辽朝政府任命的敌烈部详稳,敌烈部人。

辽朝军队平定敌烈人反叛,石刻文字亦有记载。如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年)的《萧兴言墓志》即记载了辽朝西北路招讨使萧兴言和平解决敌烈部叛乱之事。“因迪烈子叛,上以公(萧兴言)世镇西北隅,特简授遥郡节度使,利用讨伐。公既承命,止率人骑五十,入其境,会彼首领,说而质其子。由是,不破一甲而和焉,复还所虏人物。是岁从贡,今匪阙供,兼给役使十一道。上重其口,转加金吾卫上将军,改详稳司为统军司,复授三十万兵都统军。诏制闕外,专以生杀。后又以萌骨子不克,公乃九征而五帅其师,矛钺所指,罔不畏从,或犯他守,则公亦越境而制之矣。是故,四怀款附之诚,一无犬吠之警者,皆公之力焉。以此又加龙虎卫上将军、招讨使、守太子太保,兼赐勤力功臣。疆场内外,聆其威名。嚮其风声,虽孩提无识,尚犹屏气跼蹐,莫敢呱呱而啼焉。况渠魁大憝,其可犯乎?”^{[7]188}可见,萧兴言在职期间,不仅兵不血刃解决了敌烈部的叛乱,而且还“九征而五帅其师”,平定了相邻的萌骨子叛乱,最终,“四怀款附之诚,一无犬吠之警者”,虽有夸张和溢美成分,但亦反映了辽朝西北路招讨使北疆御敌平叛的职责所在。辽代“萌骨”有时也被称为“漠葛失”,即宋元时期蒙古人的祖先,源于唐代的蒙兀室韦,也是辽朝北疆部族之一。

阻卜是辽人对分布于上京道西北部的一些游牧部族的总称,有时也称之为鞑靼。阻卜因地而居,据文献记载,大致有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及阻卜别部等。辽自建国开始即经略阻卜,终辽之世从未间断。阻卜对辽时而内附朝贡,时而反叛寇边,因而,辽朝政府对阻卜的武力征讨亦时有发生。如《辽史·萧韩家奴传》即载:“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19]《辽史·圣宗纪》亦云:统和二年(984年)十一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挾刺干。”^{[14]114}等等。

辽朝武力讨伐阻卜之战事亦见载于石刻文字。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的《耶律仁先墓志》即记载了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仁先讨伐寇边阻卜之战事。“清宁九年七月十九日,皇上以北鄙挾打(鞑靼)、术不姑等部寇边,命王(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往讨之。斩首万余级,俘其酋长图没里同瓦等,驰送阙下。”^{[2]354}向南先生认为该石刻所记仁先讨伐阻卜时间有误,非为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应该是咸雍五年(1069年)正月,依据是《辽史·道宗纪》、《辽史·属国表》、《辽史·耶律仁先传》及咸雍九年(1073年)《萧德恭墓志》等。^{[2]356}笔者赞同向南先生的考证结论。此错应是墓志撰稿人赵孝严(或书丹镌石者)误将仁先平定重元之乱的时间



(清宁九年七月)安在了平定阻卜叛乱上所致。

道宗年间讨伐反叛寇边之阻卜,石刻文字所见除上述耶律仁先之外,还有其子耶律庆嗣。辽道宗大安十年(1094年)的《耶律庆嗣墓志》即记载耶律庆嗣曾两次参战平乱。第一次是在咸雍三年(1067年),随同其父仁先一同讨伐阻卜(鞑靼)。“咸雍三载,鞑靼扰边,时尚父于越(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因有请,遂假授左剌,俾从军典事。屡奏捷,授临海军节度使。”^{[2]457}第二次是在大安八年(1092年),以西南路招讨使的身份统兵讨伐阻卜,并最终战死于沙场。“大安八年,任西南路招讨。无何,西北路驰奏,将臣失职,贼众窥边。公(耶律庆嗣)承命讨伐,且不虞其兽穷则攫,遂至掩歿,时年五十有五。”^{[2]457}耶律庆嗣契丹名挾不也。《辽史·挾不也传》亦记载了庆嗣战死于讨伐阻卜之事,两者可为互证。“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诏挾不也代之。磨古斯之为酋长,由挾不也所荐,至是遣人诱之。磨古斯给降,挾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敌至,裨将耶律绶斯、徐烈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20]二者所记庆嗣战死时年龄有异,向南先生认为当以石刻记载为准。

石刻文字所记道宗咸雍年间随同耶律仁先一同讨伐阻卜的还有夏州管内观察使萧德恭。辽道宗咸雍九年(1073年)的《萧德恭墓志》即云:“咸雍己酉岁,达怛寇我边庭,逆我王命。以公(萧德恭)有夷凶之壮志,疾恶之雄心,遂选公从尚父于越晋王,讨而平之。会以贼气方盛,军粮屡空,兵皆溃以偷生,惟公执战而示死。丙戌年,尽降虏首,来返阙庭,尚父于越晋王以状闻于上,嘉叹不已。”^{[7]154}“咸雍己酉岁”即咸雍五年(1069年)。“尚父于越晋王”即耶律仁先。而“丙戌”应为“庚戌”之误,即咸雍六年(1070年)。

辽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有两大部分,一是入辽籍的“熟女真”,大致分布在东京道的东部及东南部。辽朝政府在“熟女真”地区建有南女直国大王府、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国大王府、北女直国大王府、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等管理机构。二是未入辽籍的“生女真”,主要分布在东京道东北边地,即今松花江以北的牡丹江流域到东部滨海地区。“生女真”虽未入辽籍,但也属于辽朝属国、属部之体系,辽朝政府任命女真人首领为部族节度使以羁縻管理之。

辽朝政府与女真人的战事亦时有发生,但石刻文字对其记载只检索到两条:

一是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的《耶律仁先墓志》记载的兴宗重熙年间女真寇边,皇帝诏命仁先领兵御敌之事。“时朝廷以高丽女直等五国入寇闻,上(辽兴宗)曰:‘仁先可往。’命驰驿安定之。因奏保、定二州联于北鄙,宜置关铺,以为守备。有诏报,自是五国绝不敢窥扰。上嘉之,赐予甚厚”^{[2]352-353}。此次女真寇边,《辽史·兴宗纪》记为重熙九年。“十一月甲子,女直侵边,发黄龙府铁骊军拒之。”^[21]但未记由何人统兵拒敌。另《辽史·耶律仁先传》也有相应之记载:“女直恃险,侵掠不止,仁先乞开山通道以控制之,边民安业。”^[22]但又未记拒敌之时间。仁先墓志所记除其领兵御敌内容外,还反映了事后辽朝政府在仁先奏议下于东部与高丽、女真交界的保州、定州一带设置边防“铺所”之史事,足可为《辽史》所记遗漏之补充。

二是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年)的《孟初墓志》,记载了翰林学士孟初于天庆四年(1114年)统兵与女真军队战于沈州之郊,最终以身殉国之事。“天庆四年,挹娄渤海秽种,首尾畔换,天子赫怒,方议剪覆,□□□中,可与言兵者,得翰林孟公为副师。师出不数月,捷问络绎不绝,赐御札嘉激。公率部下,乘胜转战,直抵寇所窃邑,邑城漂摇,杙在朝夕。会天大雨,河水暴